

乡土文学启蒙的发生与现代中国转型

魏策策

摘要: 在城乡关系上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城乡辩证发展观,二是城乡二元的对立理念。与西方相比,中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表现为知识阶层从对大众的启蒙转向改造农民的启蒙,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地域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后,在地方—中央意识的基础上崛起的都市对乡村的启蒙。乡土启蒙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等方式开启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路径,启蒙借助乡土得以展开,现代中国的乡土经验中孕育着现代性基因,通过乡土的方式,现代性得以在中国展开并实现。

关键词: 现代性;启蒙;乡土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2-0153-10

中国素来讲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都鄙之治在古代并无分裂,直至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城乡的文野之分。反思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世界文明发展的走向,也是当下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城乡辩证发展观,认为城乡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城乡社会特征也有重叠,两者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异质性,而是具有依存性与流动性,同时又存在竞争与互补;二是城乡二元的对立理念,认为城乡空间体系存在差异与对立,各自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功能与文化共同体,城市与现代性的价值同构,城市孕育文明或腐朽,乡村代表愚昧或牧歌,城市与乡村分别成为新与旧、中心与边缘、未来和过去、流动与静止、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的代名词。这种以中心看待边缘的眼光对城乡的经济模式、社会力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政治形式等互渗性持悲观态度,常导致两种极端的发展方向,即以“城市化为目标的城市主义”和“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乡村主义”^[1],在文学上表现为现实主义的怨乡、批判现实的哀乡与浪漫

化、主观化的恋乡,因而,传统社会形态被固化为乡土社会,中国的现代转型被界定为从乡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一场城市对乡土的启蒙也在20世纪初的文学叙事中展开。无论是“城市优于乡村”的城市主义者对乡村的思想和社会启蒙,还是乡村主义者高扬的审美启蒙,都与西方的启蒙叙事发生关联,又具有中国本土的民族特质。那么乡土的现代性内涵究竟是什么?现代作家如何借乡土经验叙述现代性?乡土如何作为一种方法成为启蒙的观念对象?鉴于现代性启蒙的未完成性与现代中国乡土启蒙在当代的紧迫性,梳理现代性启蒙与乡土叙事显得十分必要。

一、作为现代性反面的乡土

“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事关其起源,还涉及其意义。”^[2]对现代性起源与意义的理解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如现代性代表着全新的时间意识与历史观,现代性带来新的价值秩序,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况,现代性是一种态度,等等。马克思认为在中世纪晚

收稿日期:2024-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研究”(21XZW020)。

作者简介:魏策策,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049)。

期城市自治运动已为资本这一现代性的动力之源创造了条件,韦伯肯定新教伦理对现代化的根本作用^[3]。而现代发端于启蒙运动的观点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得到更多的认可。人类社会的工业转型初期,首先开启了以理性和知识为鹄的的启蒙思潮。西方的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展开对传统和权威的“去神圣化”还原,强调宗教、自然和历史并非崇高的圣迹,而是理性麾下的平常之物,以此打开人的现代维度。卡西勒把现代人与启蒙关联起来,认为启蒙开启了现代西方:“现代人,启蒙时代的人,对这种选择不可能有任何犹豫。他必须而且应该拒绝所有来自上面的帮助;他必须自己闯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当他能凭藉自己的努力赢得真理,确立真理,他才会占有真理。”^[4]总的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推动了西方近代文明,在人的个体性与主体意识被唤醒后,启蒙运动则在科学、民主、自由等加持下“发明”了现代世界,使人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和自我主宰的理性主体,进而为西方资本主义设计出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未来指向进步这一信念的召唤下,现代理性精神武装了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自我启蒙之后,开始了对民众作为独立理性个体的主体性启蒙,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启蒙也随之展开。乡村和城市的关系隐含着现代的发展曲线,近代以来,乡村作为等待启蒙的客体,在现代性的想象中也呈现着复杂的动态性。

古代西欧社会处于城市乡村化阶段,城市生活依存于乡村;到了中世纪,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中,城市处于高位,但二者依然处于共生关系;直至工业化时期,乡村下属于城市,处于城市的支配中;在工业化之后,乡村逐渐趋向城市化,进而达到“类城市化”^[5],城乡的差距和等级之分越来越小,城乡一体化之后,城乡功能定位各安其分,城乡日趋平等。上古中国虽和古希腊、古罗马以城邦为主导的社会不同,但也形成了城邑主导下的宗法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国”本有城市的含义,早期形成的“国”就是指城邦国家,“国人”和“野人”是区隔分明的两类生活方式,历史书写的主体依靠“采诗”“献诗”收集乡风民俗,而顺应农时勤于耕作的农人是沉默的群体,此时的乡村书写是一种城市对乡村的高位远距感知,其中也不乏悲悯之作。刘成纪认为:“中国最早的乡愁诗往往是城市性的,如箕子的《麦秀》、《诗经》的《黍离》以及屈原的《哀郢》,均与作者曾经生活的城市有关。《庄子·则阳》讲‘旧国旧都,望之怅然’,也是以废墟化的城市作为情感的原乡。”^[6]

“农村与都市本来无甚区别。都市原不过是农村的扩大,后来因为农业封建社会的崩溃,都市变成了政治中心,而一切文化文明始起源于都市。”^[7]随着安全防卫和贸易的需要,城市也随之发展起来,城市之外的广大地方被统一看作乡村。中国古代城市是经贸中心、政治中心,也是官吏与商贾的聚集地,乡村虽处于城市的统治下,但城市并没有对其形成强剥削的态势。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与告老还乡激发的知识阶层的城乡流动,文学中乡土经验的人文合一性也随之加强。近现代社会在工业化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及政治规约下,形成大城市、小市镇、乡村的多层混合结构,城市对乡村的过度攫取导致城乡分离发展,城市成为乡村的启蒙者。中西方的城乡关系都经历了乡村孕育城市、城乡分离或对立、城市宰制启蒙乡村、城乡结盟为共同体而走向融合的过程。而在启蒙时代,随着出版业的规模化发展,城市成为知识的生产地,知识分子聚集的城市对乡村的启蒙集中体现在知识阶层对农民的启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进步思想洗礼的中国知识阶层试图把理性的光辉烛照于中国大地,他们用手中的笔塑造了一系列形象,借以教育民众、改造社会,启蒙思想文化氛围一时蔚然成风。

现代性视角下的城乡文化思维认为乡村和城市处于对立之中,乡村及其蕴藏的传统是现代的阻碍。这种思维代表着对进化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即认为城市代表的现代发展模式代替传统乡村具有必然性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也就是人类文明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过渡趋势最终会形成乡村—城市连续体的理念得到更多认可。滕尼斯用共同体、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差异定义乡村和城市这两个异质空间的文化模式,认为“乡村这样的共同体是一个自然意志(natural will)主导的礼俗社会,都市则是一个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主导的法理社会”^[8]。在西美尔的论述中,传统乡村处于稳定、惯常的节奏之中,代表现代的都市则以变化与刺激为常态,都市人形成了冷漠、麻木、陌生化、单向度等特质,乡村是人性深处眷恋的乡愁。“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地、更惯常性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这正好与更深刻地立足于感觉与情感关系的城镇生活形成对比。后者扎根于精神的无意识层面,并在传统的稳定节奏下最易生长。”^[9]斯宾格勒

在《西方的没落》中对进化的文化危机的诊断也是以城乡的崩溃作为观察对象：“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10]马克思对城乡二元的论述更加深入：“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1]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文化》和《俗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乡村城市两分的二元观，将农村社会的研究纳入人类学视野中，认为乡民社会分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由国家与聚集在城镇的知识阶层、市民们掌握的文字层面的文化传统，而小传统是村落社会居住者口传的文化传统。这样，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有了城镇的过渡。费孝通、萧凤霞曾分别以江村和中山小榄镇菊花会为标本，探查乡土性中地方社会文化的总体关系和中国人内在的民族心理结构。

从乡村与城市关系的已有论述中，不难看出，乡村愚昧的成见是由现代的视角建构的，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热衷讨论的乡村，实际上成为现代性的背面。谈论乡村就是探讨什么不是现代性，进而确证何谓现代，而乡愁或大地就成为漂泊的异乡人永远依恋但总在返乡途中而难以到达的心结。“故乡”亦如大地，“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das Bergende）”^[12]。乡村到城市的转换意味着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是一种模式的转型，而农民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中往往被当作缺乏现代理性的沉默群体，是启蒙的主要对象。那么，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是否是截然可分的？在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的启蒙如何与西方的启蒙实现对接？中国知识阶层和作家是如何看待乡土和农民的？传统中国如何以乡土作为启蒙的方法与途径通向现代中国？

二、乡土作为现代启蒙的方法和路径

西方何以先于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中国知识阶层往往将西方现代的源起归至启蒙时代。在启蒙主义时代，以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于1751年至1772年间共出版35卷《百科全书》，展示了启蒙者对建立前所未有的

人类知识体系的极大兴趣与野心。这部知识的总汇按照人的理性思维将科学、艺术按照字母顺序贯通起来，识字的人可以用此工具书完成自我教育和知识启蒙。晚清以降，“启蒙”已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共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二字作为公开出版物的名称，最早出现在1902年创办的《启蒙通俗报》《启蒙通俗书》等报刊中。这些报刊开设“西国新事”“中国新事”等栏目，以讲书的方式把西洋新事和中国史事进行对照启蒙。《启蒙通俗书的章程》中说：“这个书的用处，是专为小孩子起见，所以叫做启蒙；又为平常百姓，字墨不深的人起见，所以叫做通俗。”^[13]可见，“启蒙”在现代中国的含义最早是在开蒙、蒙学等传统意义上展开的，主要指一种中国启蒙之法，先教儿童认字，“早发其心志”^[14]，使儿童能“历阶而进升堂入室，蔚为有用之才”^[15]。“启蒙”常与小学堂的名字联系起来^[16]，古人把入门读物称为启蒙，启蒙也从儿童教育进而扩大至群蒙范围，从创建儿童学堂发展到创办成人义学，而成人教育的重点群体是妇女和农民。例如“就乡隅创设义学以化群蒙而成善俗”^[17]，“人之囿于乡曲，而得以稍知世事者，亦未始非画报之益”，“不特乡愚宜阅，妇女亦何不可阅”且“最宜于小儿”^[18]，这些当时颇为风行的言论是士大夫阶层原本垄断的知识传授到乡愚、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目标路线。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教育和扫盲是启蒙的代名词，具有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早期的对成人一般不言启蒙发展到后来的民众教育都属于启蒙，是中国独有的特点。

中国的启蒙思潮对于理性主义的关注远远低于对科学、民主的信奉，中国的文化启蒙是以救国救民、开启民智为目标，主要体现为以文化运动、乡村运动、文学审美等联袂开展的思想启蒙、文化批判以及革命动员等。陈群在介绍欧洲思潮时，对启蒙彰显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对排斥循俗主义的卢梭和个人主义极为推崇，他认为“文人思想都被冷涩干燥的理智和固定不移的形式”^[19]困住。邓晓芒认为，汉语的启蒙实际上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反启蒙^[20]，因为知识阶层尚未完成真正的自我启蒙，由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他们快捷地引入现成的思想工具，这种拿来主义使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在对象和方式上并不一致，因而不能以西方的理性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启蒙。

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有以下特点：第一，在求生存求变思维下，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知识阶

层对大众的启蒙聚焦到改造农民为国民的启蒙路径;第二,近代中国地域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在地方—中央意识的基础上崛起了都市对乡村的启蒙;第三,中国启蒙对新民救国的追求诉诸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希冀。知识阶层倡导大众教育与个性解放、呼唤反叛精神、开启民智等思想,在导向上以教育强国为主,面向大众教育、公民教育、普及教育、国民教育,具体的对象主要面向农村、农民等,对其进行人格独立、进取、自由等的启蒙,以增强民族自强不息的能力。这就关涉农民是否具有理性这个争论,在“非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相关性的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经济人”理念与“文化范式”理念之间的论争。“经济人”理念源于规范经济学和理性主义哲学,它主张全人类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潜能。这种欲望和潜在在古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但在“启蒙”之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21]。小农经济的思想 and 商人的行为动机差别很大,小农只停留在消费满足的程度,是不会轻易冒险的风险厌恶者。“中国的农民,土地无所有权,经济无独立权……知识幼稚,能力薄弱,从来没有团体的结合,经济的组织。”^[22]晏阳初对民族再造遭遇的顽疾“愚、穷、弱、私”的诊断中将农民置于前现代的落后地位,假定农民不具有理性,在现代及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存在着由传统到现代过渡的障碍,但他对农民群体封闭、愚昧的认定没有应用到市民和其他民众上;梁漱溟则力主文化复兴,主张以乡村学校化的教育完成乡村文化的自我拯救;卢作孚办实业,将教育和经济结合起来,力图实现乡村现代化;陶行知等开展的平民教育实验是以教育开启启蒙的时代运动,灌输教育与科学,普及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的自主化、对生活的规划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等,以开发农民作为经济人的潜能。乡村建设运动与乡土文学的兴起是国人对乡土中国想象落地的产物,是启蒙思潮向下层社会和更广大乡村的深入。已有的研究对启蒙指向20世纪文学中的乡土想象多有论述,认为文学卷入了乡村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①,但对于乡土如何作为一种启蒙方法的时代语境和运行机制鲜有提及。概括来讲,乡土启蒙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开启中国现代转型的道路。

第一条路径是时间的空间化。也就是将时间的差距转化为中西方的差距,进而在时间意识开启全球同步时间轴的培育与植入,使中国人进入世界人

的序列。知识阶层首先利用时间实现启蒙的正当合法性,将农民作为启蒙的对象。

当时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中国的知识阶层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和乡土世界依然停留在18世纪。洪本桑把农民分为乐天派和激烈派,认为农民是启蒙的主要对象。“如果农民有十分的觉悟”,“我可以这样说他们是18世纪以前的人物,他们的知识,实在是等于零”^[23]。“乡村的生活,还是像在18世纪一样,这实在是中国人的奇耻。”“中国的乡村,差不多是农民独有的。乡村既是农民住的地方,要改良乡村,须先改农民。”^[24]在当时返乡归农口号的倡导下,实际发生的却是离乡离土潮:“政治台上人只盼望高升,不愿干下层;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农场上的壮丁也变成了机器旁的健将;田野中拾粪的村童也做了铁道旁捡煤的小孩儿;乡村小学的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乡下种菜除草的村姑也乐意跑进纱厂去做工;其他一切工厂商店游戏场跳舞厅无不需要大批的青年男女去拼凑……乡村呢,地旷人稀,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纪头脑习惯的人在过着十八世纪的生活。”^[25]很明显,随着世界意识而来的现代观照改变了乡村的时间结构和人们的时间感知,在西方时空坐标下的定位下,中国成了世界的过去模样,就有了老中国和少年中国的区分,有了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自然也有了现代与落后之分。农村无法留住读书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巨大的时间错位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是200年的差距,这源于启蒙的缺失。在他们看来,18世纪前是尚未接受科学洗礼的时代,是手工的时代,代表着原始、落后、愚昧与封闭、保守。18世纪是西方世界近现代的转折,成为人类征服世界的一个标志性时代,深深地打上了时间纪元和现代叙事的烙印。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将农民和农村放置于中国特有的朝代纪年的时间意识,没有从中国历史朝代中选择一个时间概念来定义20世纪初中国农民所处的时空,而是使用“世纪”这个西方舶来的概念来指代当时中国农民所处的时空?为什么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农民滞留于18世纪,而不是17世纪、19世纪等?“世纪”这一概念催生出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与乡土的关联何在?

在中国,虽然记录帝王世系的典籍中也有“世纪”一词,20世纪初也曾出现《新世纪》等宣扬世纪

理念的杂志,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纪”概念之定型,则是1908年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出现的“百年”含义。晚清时期译介作品中介绍外来世纪观念时也受到“西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的影响^②。20世纪作为新旧两个世纪交界的思维方式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开始侵入中国人的生活,在当时的知识阶层看来,这是中国与全球共鸣的一个标志,中国人跨入20世纪意味着不被时代抛弃,20世纪的时间观念成为中国生死存亡的一种标志。“今日已二十世纪矣”等呼告,“研十九世纪之往迹,挈二十世纪之现势”“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③的行动方略,成为启蒙者的方法手段。知识界特意将20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时空定位于18世纪,将地球的时间性和特定人类生活置于同一个框架内,自我强加全球同步的时间轴的步伐。这种时间概念的更新一方面意味着新的标准和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破旧立新的思维方式的植入。中国原有的时空思维难以阐释世界和中国自身的变化,难以将自己融入急剧变化的世界框架。当时中国的农民未能进入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内,基于改造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强烈愿望,知识界采用了“世纪”这个新的表述范畴。18世纪作为一个对中国时空的概念偷换,是一个陌生化的手段,体现了中国人在世界意识支配下以20世纪作为时间坐标的中心和结果的思维方式。立足于20世纪的世界,18世纪就是形成20世纪之果的历史和原因,而中国农民与全球时间轴之间相差两个世纪,当以18世纪眼光看待时,对于知识界而言,新的意识和行为方式就会应运而生,知识分子自然从农民中脱离而出。作为20世纪的引路者,知识分子将农民带入现代社会,这正是西方启蒙思想主导下中国知识分子将农民作为受教育对象审视的结果。将18世纪作为西方人的启蒙时代移植到中国的渴望与尝试,也导致中国学界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19世纪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西方理性主义的弊端及其导致的战争、秩序危机使他们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在慕强思想影响下,他们认可将18世纪作为人的开化与民族国家壮大的起点,认为以时间进步主义指向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依赖现代时间的同构,最终指向20世纪之中国的未来。

正如汪晖所言:“‘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

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这是全球范围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26]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采用这种方式将欧洲历史和中国现实勾连起来,18世纪作为因果链条上的因被整合进中国转型的思想资源,将农民定位于尚待唤醒的18世纪之愚民,则成为一个合法而紧迫的时代问题。这样一来,对于时间的追赶就转移到对乡土空间的改造上,乡土世界作为旧时间的象征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得以缓和,保留下来的双重时间意识将中国的时间观与西方的时间观整合起来。因而,乡土问题成为开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则蛰伏于广大的乡土空间之中。这也是为何乡土能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之际被创造与发现,为何现代作家们秉持着以西方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参照系,而以剖析现代性的反面——乡土来介入中国的现代议题的根由。

第二条路径是空间时间化。中国知识阶层基于文化意义上的对比,将西强中弱的空间格局以进化论式的时间重构呈现出来,将空间关系转换为时间关系的思考,在把中慢西快的时间差距转换为空间上的乡土进行尝试的方法意识下,将乡村和城市两个迥异却相关联的空间区域进行时间线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新定位。

汪民安认为,18世纪以前空间和地理组织的方式是乡村,其特点是固定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乡村空间依靠血缘、家族以及土地、植物等自然要素编织其组织,由于乡村空间的封闭性,导致乡人对其他空间缺乏感知,而对时间之变、季节之变异常敏感^[27]。工业化使城市从乡村中横溢出来,以往的城乡关系被打破,中国惯常思维中的时空框架被打乱,乡村原有的秩序不再,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城市孕育了近代文明因子,尤其是在现代思想的洗礼下,在各种工人运动的号召下,都市劳动者大部分已经有了觉醒意识。农村的劳动者则处于心理麻醉状态,奴性心理较为严重,对黑暗、专治统治习以为常。城市作为一个崛起的现代空间,其强势吸纳之力不可小觑,不仅造成乡村在人才、教育、经济等方面的边缘化,进而使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就连农村的地权也流入“住在都市里的地主们手上”^[28]。

现代意义上城市的快速发展,为知识分子和文人提供了新的栖身空间。乡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成为一个被知识分子观照的他者空间。知

识分子们虽然身居都市,却摆脱不了三重印记。一是个体身份的地方性。古时“眉山苏轼子瞻”这样的题写籍贯、姓名、字号的延习在近代出版业勃发之际仍有体现,不少著作在版权页还会标示“霁溪翁”“闷人”等籍贯信息。二是中国的地域文学传统。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学风貌,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诗经》《离骚》开启了南北文风的路向,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曾界说南北书派之不同,近代的海派、京派都是文艺与地域联姻的有力证明,我们熟知的莫言、马尔克斯是将地域文学推向极致从而走向世界的范例。虽然文人流动性的加剧使得划分地域文学的天然固定条件已趋消弭,但地域文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现代的资源滋养了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则是在大地上生长出的庄稼”^[29]。三是传统的重农与悯农思想。中国一向有重农思想,认为“农者,生民之大命”^[30]。

现代乡土文学并没有严格的定义,既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也没有一定的写作章程。在鲁迅提出“乡土小说”这个命名之前,政治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等一时蔚为大观。20世纪的最初十年,描写农村或乡土的小说多被纳入教育小说、冒险小说、益世小说、理想小说、滑稽小说等名目下。据笔者目力所及,最早的短篇乡土小说是1904年发表的《田畔妇人》^[31]。这篇小说讲述了山东一个男子被德国士兵杀害,妻子及妻妹被奸污而自尽的凄惨故事,目的是以国辱唤醒大众。但早期的乡土小说大多是对农村现实苦难的白描,并不具有鲁迅所谓的知识分子对乡土远距离审美后产生的强烈的启蒙意识。只有当乡土与人的启蒙、民族国家产生紧密关联时,乡土启蒙作为现代性追求的一面才会展现出来。

城乡属于中国内部的空间划分,近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空间的凸显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空间,那就是世界。急于与西方主导的世界进入同一空间的认知改变了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传统的天下观被万国或世界取代,国族变成一个竞争单位,对标西方的时空,中国被贴上“尚处于18世纪的乡土中国”的标签。身处其中积极应对这种竞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向上或向外流动与学习,一方面向下进行国民启蒙,力图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下渗到普通民众之中,使民众转变为国民,进而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他们身上携带的地方性和地域文化以及重农思想使其在国族建构上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地方为切入点,地方可大可小,既可以是一

村一乡,也可以是一城一国。在方志编修发达的中国,方志不仅有关一地的风土、文献、历史、地理,更关乎资治与教化,地方最易唤起国人的爱国之情,在以血缘、地缘为主导的中国,启蒙的路径就是从地方主义开始,由爱乡而爱国。激发地方文艺对国民的塑造和地方文化的保存与审视是最有效的手段,各地丰富多样的地方文艺组成立体的中国空间,书写地方文艺既可以剖析自我,锻造新的国民性,又可以形成合力,以各地发力团结助力建设民族国家。

乡土和地方的概念有很大差别:地方更倾向于地理性,乡土则在地理空间中包含了伦理与地缘;地方相对于中央而言,天然地是国家主义的构成元素,因而更多地与国家制度相关,乡土则是人的身心栖居之所,更关注人的情感与日常生活;地方的城乡之分比较模糊,乡土却含有发达与落后的隐喻,所指涉的对象既可以是相对城市保守的乡村,也可以是在世界坐标中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能够将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嫁接在一起;地方容易被限制为具体的空间和地名,乡土的外延却可以无限放大,各民族的血脉之地都可以是本乡本土,乡土可以成为全民族乃至全国、全球的代名词。

20世纪初,中国农村保守的孤岛式模式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封闭而内敛的再生产机制,不可能使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各个单元,冲破自己的疆域而组成一个同一文化的民族主义共同体。但是,工业主义的内在要求打破了这个封闭的单元及其恒久的再生产机制。”^[32]“要是没有经过民族主义,想站在这优劣竞争的世界里,是万万不能的。”^[33]但是对地方色彩的重视容易突出异质性与特殊性,而缺乏普遍性与超地域的世界性。地方拼图般地构成了中国的全貌,地域文学传统成为乡土文学发展的中国之根。乡土文学作为文化的交流打破了原有的封闭乡村,也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得以生发,乡土文学也因而成为乡土中国通往现代性想象的通道。

我们以往过多强调乡土文学的发生基于工业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于文学发展的内部运动重视不够,也就是对于乡土文学对本土地域传统的继承缺乏应有的关注。以往研究中把乡土性视为落后与封闭的象征,忽视了乡土的丰富性和创新力。从乡土文学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视野看,乡土文学对文化人类学、民族主义、文学地图学等外来理论进行了合理吸收;从乡土文学的内部发展逻辑看,乡土文学的思想资源实则立足于中国文学实际与地域文学传

统。也就是说,乡土文学的发生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文学逻辑,乡土文学的发生有外部原因和内在机制。地方文艺成为乡土文学的基础,一方面乡土志和地方文艺的积淀为乡土文学的萌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作家们在乡土地理地域和乡土文化地域方面丰厚的创作实践成为乡土文学的支撑,从而形成一个乡土文学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和作家希望表现或反思乡土文化及中国人的根性,张扬乡土蕴含的真善美,以乡土为方法和理念的创作大量出现。因而,那种认为中国文学如果不把从他人那里“借来”的现代性作为根据,“现代文学”便无法成立^[34]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乡土文学正是从中国大地上生发出来中国现代文学。

20世纪20年代初,突出地方色彩和方言的乡土文学创作形成热潮,成为新文学创作实绩的重要力量,乡土文学也可以称得上中西并包、借鉴他者、完成自我的文学范式。当地方文艺和乡村结合起来,地方变成乡土的路径和元素时,乡土文学就诞生了。乡土文学中的“土”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土地的滋养之力。土是养分的来源,是大地和财富的象征,能生生不息地创造新的生命。二是自然的风土、地理人文与历史的风土。风土代表着民间与地方性根基,是农业文明下民族特征的体现,承载着人的生存意义,人正是在地理化、历史化的风土之中认识人自身。三是土人之意。土人在当时常被用来指代菲律宾、印度、非洲等地需要开化的蛮族^[35],后来也被用来指代中国人。鲁迅曾说:“杭州英国教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序,称中国人为土人;我当初颇不舒服,子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后来因其所指,多系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36]但鲁迅又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土人,他把中国人分为高等华人、作乐的奴气同胞和默默吃苦的土人等几类^[37],在他看来,看似不合潮流的土人代表着大众,是中国社会的力量所在。四是情感能量。土中包含的情感力量涵盖农村,指向中国精神。在乡土的感召下,每一个个体都是地之子和故乡的孩子,乡土可以调动起人的乡愁,乡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乡土中国以将中国地方化的方式进入世界叙事。乡土文学就是一个以地域为根基、扎根中国大地、隐喻现代民族国家的方法论概念。杜赞奇认为:“对于家乡或乡土的现代迷恋是有关地方(the local)或区域(the regional,汉语中称为乡土、地方)的现代表征的重要组成成

分。在20世纪前半叶,‘地方’被普遍(尽管并不仅仅被)表征为一个更大的形成物——如民族或文化——之真实价值观念(authentic values)的地点,这种真实价值观念尤其在乡土当中得到具体体现。”^[38]

中国以往的地方—中央构架难以与世界融合,但乡土的中国却可以纳入世界秩序,找到追赶的起点。乡土这个概念被赋予新的意义,用以应接时势之变,地方成为开启乡土文学的方法和路径。在中西空间的对比下,在中国内部城乡空间的区分下,乡土文学将空间时间化,形成全民族的认同感,进而达到民族认同,以此达到国家的认同。众所周知,民族建构其实只是认同感建构的一种形态,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更多的是情感和认同感建构。知识分子、艺术家与作家在民族主义文学上的主导因素不可忽视^④,或者说,他们对于民众情感和社会情绪方面的引导价值是十分重要的。由乡土到国家的逻辑就是如此,对乡土的关注既有留恋也有批判,在保存地方文化的同时也在鞭挞乡土。如曹聚仁对光绪年间礼教决防、宗法没落、农村破产等情形的描述:“资本主义的铁锤,不偏不斜,第一锤打在‘礼教’的头上;男女之大防,完全溃决下来;变态性欲的火焰,以各式各样表现出来,成为报纸上所谓社会新闻的唯一题材……年轻的男女们,从大家庭中逃出,从宗法社会逃出,他们向都市去,在亭子楼中过他们的小家庭生活。乡里的老父在那里吃苦叶菜,城里的儿子在这里喝咖啡;乡里的老婆在那里抽烟,二三块钱一两,抽的人仍是很多。上小学的学生,至少有二十五岁;但他的父亲,纳不出烟捐,一月要打三回屁股。农村破产,农村破产!农村就这样江河日下了!”^[39]此外,许杰的《赌徒吉顺》与潘漠华的《冷泉岩》写到典妻,彭家煌的《节妇》写到转房婚,台静农的《蚯蚓者们》和罗淑的《生人妻》写到卖妻,台静农的《烛焰》写到“冲喜”悲剧,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摹画了冥婚,沈从文的《萧萧》和彭家煌的《喜期》写到童养媳……乡土小说中描述的共妻、再醮婚、转房婚、荒婚冲喜、童养婚等陋俗,流露出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给乡土社会贴上了落后的标签,表达出期待通过移风易俗清除中国现代进程中思想障碍的启蒙意味。

三、启蒙视野下的乡土文学

在西方启蒙逻辑下,乡土和传统会成为现代性

的反面。与西方启蒙运动对理性之光的强调不同,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声浪下发展的思想启蒙浪潮,试图以改造和教育完成启蒙的任务。政界和学界出台平民教育的各种文件,诞生了《平民教育》《通俗教育丛刊》《大众教育》《平民月刊》《大众文艺》等众多刊物。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高呼“新民说”,“国民性改造”的呼声不绝于耳。启蒙者认识到走向民间、普及教育、启蒙大众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启蒙的第一要务是施行教育。政府和学术团体倡导的平民教育,所指并不明确,妇女、贫民、劳工、农民等都包含其中。最初的普及教育、国民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政令或口号多聚焦于农民教育。达继元认为:“吾国人口总数为四万万,据云未受教育之人占百分之八十,以四万万相乘则有三万万二千万之多,以如许之未受教育人民而欲与欧美争文明竞强弱盖豪其难矣。是以吾国各大教育家有鉴于此,举起倡办平民教育以谋补救,力竭生思无时或懈……于是平民教育之声浪渐渐慢于全国矣。”“盖县民之智识见闻远不及省民,识字更无论矣,而不识字者尤以乡村中之农民居多,工商次之。吾国以农立国,是农民之强弱及国家之强弱欲国家强则平民教育尚焉……”^[40]在普及平民教育的过程中,农民因为数量占比最高、受教育程度最低,而被列入教育序列的“优先级”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只有解决了农民的经济和精神问题,中国才能步入现代国家。当农村教育和农民教育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时,农民自然就成为被拯救的对象。如果说中国的现代转型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是以对现代文明的追赶和对农民群体的现代改造为手段而展开的。

改造农村和农民,首先体现在城市对乡村的救济、全社会对农民的诊断和全民下乡的动员。全社会站在都市的立场,认为都市有救济乡村的责任,所以,以往作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地位不断下降,乡村和农民、城市和知识分子成为关联的对立面。早期的乡土文学带着社会问题小说的烙印,渗透着知识阶层深深的悲悯之情,为苦难的国家哀伤,为劳苦大众的命运“而呼号”“而战斗”^[41]是现代乡土作家写作的基本动机。

乡土文学对于启蒙的主要贡献在于由爱乡爱国而凝聚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感召力,其中既有引领全社会对农村、农民的发现,也有对知识阶层软弱性的敏锐书写,直接碰触到启蒙的有限性与未完成

性。从社会层面看,大多数乡建实验难以为继,就连知识分子最合适的乡村教员工作也难以吸引城市的读书人,读书人关注乡村和农村的思潮最终无疾而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多以一种“我们”看“他们”的外来俯视眼光看待农民^[42]。知识分子对农村的文化介入一方面是由于使命感,另一方面来自对政策的响应,但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乡土小说中反映了当时的返乡与离乡潮。例如《乡村》中的“我”在归乡思潮的影响下,决心献身农村教育,但在回乡做教书先生的第一天就受到冷遇,带着绝望准备逃离乡村。“为了把心灵从都市生活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幻想着乡村”^[43],把土地作为最终的归宿,没有土地的人便带着烦躁不安的梦想,计划着从别种易于赚钱的职业中捞取到足以置办几亩土地的资金。叶圣陶的《倪焕之》中,倪焕之从带着“理想”上场到教育救国失败后的迷茫失望,悲观地表达了“被故乡所放逐,被生活所驱逐”的启蒙者的高姿态、启蒙者与农村的隔膜、启蒙者对农村的失望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启蒙的理想难以实现。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中的子平本想解救故乡的父老乡亲,但他身上的城市气息和理想化的理念遭到排斥,最终在旧伦理和旧势力的合谋下命丧家乡。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的排斥,也体现在底层盘根错节的乡村结构以及农民质朴可爱的一面,仅仅从启蒙视角入手,并不能真正揭开“乡土文学”的神秘面纱^[44]。乡土文学中塑造了丰富的农民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彭家煌《节妇》中的阿银、王鲁彦《李妈》中的李妈、鲁迅《离婚》中的爱姑、许杰《放田水》中的阿元嫂、台静农《拜堂》中的汪大嫂、许钦文《鼻涕阿二》中的菊花以及《屋顶下》的阿芝婶等女性形象,虽然具有农民的质朴与保守,但也有反抗和觉醒的一面。

正因为如此,启蒙的另一面就有了向内的自我分析与民族觉醒。乡土文学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审美性,乡土性中包孕着现代性,为数众多的农民成为一个充满变化和可能的动态群体。他们虽然暂时处于落后状态,但蕴含着值得期待的革命力量。社会启蒙将农民视为生力军,期望通过启蒙使其走上革命道路,建立新的世界,革命成为启蒙的行动化,启蒙则为救亡创造了思想基础。这也是乡土文学激进的一支发展为左翼乡土文学,迅速介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的原因。在左翼乡土小说中,农村不再处于18世纪的僵死循环中,而是焕发着革

命力量和希望的热土,这标志着乡土小说的重要转向。王铭铭认为,作为社会群体,农民有时被视为保守的力量,有时被“推戴为”革命的动力,对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可以有自相矛盾的界说。不过,农民的文化向来被划归为需要现代化改造的或阻碍现代化的实体^[45]。作为“现实变革力量的增长”^[46],新文学找到了乡土小说这一载体,左翼乡土文学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有效实践,是乡土中国现代性和生命力的产物。

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的初期,已经看到19世纪西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启蒙运动寻找精神资源时,已经隐隐意识到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如理性对感性的吞噬、强调国民启蒙对民族文化丰富性的遮蔽。鲁迅和茅盾等秉持着思想文化的启蒙立场,对社会制度进行抨击。沈从文的《边城》和废名的《竹林的故事》隐含着对启蒙者的高调西化和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侵袭的反思,可以说是对启蒙的反启蒙。这种反启蒙正是站在中国的传统之上与启蒙构成富有张力的一体两面,是“浪漫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观念融合了启蒙思想”^[47]。相较于西方的浪漫主义对启蒙的反拨,中国的启蒙和浪漫主义都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气质。正如梁鸿所言,“乡土中国”的诞生是观照视野下的产物,是自“天朝中心主义”被打破之后就开始慢慢被呈现出来的“自在物”。这一“自在物”悬浮于民族的观念之中,与新生的思维、新的文明方式形成对峙。它有着来自久远历史和时间所塑造出来的坚硬和愚昧,但又充满悲伤,因为它是古老中国的象征物^[48]。

结 语

乡土对时空的转换或营造的怀旧空间是对现代的线性时间观的反叛。乡土文学以其开放性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中国的现代性是从乡土中生出的现代性,不仅仅发生在都市,更发生在乡土。吴晓东认为:“乡土和都市的故事构成的是二十世纪具有总体性的大叙事。”^[49]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是传承农业文化的社会空间。近代中国,乡村呼应城市的需求,成为一块画布或一个试验场,所有的运动、意识形态、政治集团和个人革命者争先在上面描画其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乡村成为问题后,促逼了乡土文学的发生。乡土文学也是一场文学实验,地方文艺的发展与彼时盛行的民族主义不谋而合,

而乡情地缘空间的书写、对农民和平民教育的强调,使乡土文学一呼百应,蔚为大观。如果说世纪末包括世纪的使用是一种外来的震惊,是对19世纪造成的历史断裂和文明危机的判断,那么乡土概念的嵌套就是应对中国文明断裂危机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启蒙借助乡土得以展开,只有通过乡土的方式,现代性得以在中国实现,现代中国的乡土经验中孕育着现代性基因,是对中国再造新文明的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看,重新被发现的乡土连接起了19世纪的中国与20世纪的中国在新旧之交两个链条的连续性,具有隐性而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乡土文化再造了中国新文学,乡土文学再造了中国新文明,为中国人保留了新旧中西的时空意识和文化的双重感受,对于考察中国地域文学传统和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角色及其与乡绅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乡村与城市的互动发展中,人们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误区,如罗雅琳所言的“城市高于乡村”的文化等级观念及其延伸出来的认定乡村的问题只有靠现代化和城市化才能解决的发展主义思路、将乡村视为神秘和原始的浪漫主义思路等^[50]。因此,“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还在持续对接中,城乡融合的共同体尚在形成之中,乡土启蒙仍然需要关注。

注释

- ①详细论述参见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禹建湘:《20世纪乡土想像中启蒙与现代性的悖论》,《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②参见古城贞吉:《土耳其论》,《时务报》1896年第11期;木村浩吉:《十九世纪海军之进步》,《清议报》1900年第51期;大隈重信:《前后二世纪之中日二国》,《清议报》1900年第56期。③参见庸谨:《处二十世纪西力东渐时代》,《竞业》1900年第1期;《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④Juan J. Linz.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n Review*, vol.1, no. 4, 1993, pp355-369.

参考文献

- [1]刘守英.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J].中国乡村发现,2022(3):11-14.
[2]史密斯.现代性及其不满[M].朱陈拓,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4.
[3]钟明华,魏明超.现代性是如何生成的:马克思和韦伯的视角[J].现代哲学,2009(2):43-48.
[4]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31.
[5]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3(11):183-203.
[6]刘成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N].光明日报,2021-09-25(10).

- [7] 曾济宽.从现代农村问题的特质说到中国农村问题[J].政治评论,1933(40):6-16.
- [8] 腾尼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M]//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57-69.
- [9]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2-133.
- [10]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93.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
- [12] 海德格尔.林中路[M].吴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6.
- [13] 启蒙通俗书的章程[J].启蒙通俗书,1902(1):1-3.
- [14] 启蒙要言[N].申报,1891-12-24(4).
- [15] 启蒙有术[N].申报,1901-10-04(3).
- [16] “创办启蒙初等小学堂”[N].神州日报,1907-07-14(7).
- [17] 吴宗瑛.粤东创启蒙学议[N].中国教会新报,1870(90):6-8.
- [18] 论画报可以启蒙[N].申报,1895-08-29(1).
- [19] 陈群.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一瞥[N].民国日报,1919-11-06(8).
- [20] 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J].史学月刊,2007(9):10-15.
- [21] 王铭铭.现代的自醒:塘东村田野考察和理论对话[M]//潘乃谷,马戎.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935.
- [22] 天玄.农民教育之必要[J].实业杂志,1921(3):1-4.
- [23] 洪本桑.不可忽视的中国农民教育[J].批评,1923(5):4-6.
- [24] 包寿眉.谈谈农民生活的改良[N].时事新报(上海),1927-01-17(8).
- [25] KL.乡村颓败了——到乡间去![N].民国日报,1930-01-12(12).
- [26] 汪晖.世纪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93.
- [27]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133-134.
- [28] 费孝通.农村土地权的外流[J].今日评论,1940(11):170-173.
- [29] 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2023(9):46-60.
- [30] 语农[J].北洋官报,1902(9):3-5.
- [31] 田畔妇人[J].大陆报,1904(4):118.
- [32] 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7-178.
- [33] 蕊卿.血痕花[J].浙江潮(东京),1903(4):147-163.
- [34] 坂井洋史.关于“东方”现代文学的“世界性”:以竹内好、石母田正和周氏兄弟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为例[J].谭仁岸,译.山东社会科学,2017(1):68-76.
- [35] 土人开化[J].北洋官报,1903(79):14.
- [36] 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卷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8.
- [37] 王世家,止庵.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卷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4.
- [38] 杜赞奇.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M].褚建芳,译.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21.
- [39] 曹聚仁.启蒙期史话[J].中国语文学会期刊,1937(1):68-91.
- [40] 达继元.平民教育[N].盛京时报,1926-4-16(5).
- [41] 余荣虎.早期乡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理论、思潮之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38-45.
- [42] 罗志田.失本:民国前期无疾而终的归农思潮[J].天津社会科学,2022(6):128-139.
- [43] 威深.乡村[N].大公报(天津),1935-7-31(12).
- [44] 宋剑华.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历史复杂性[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96-105.
- [45]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43-147.
- [46] 赵顺宏.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百年变革的文学书写[J].中国社会科学,2023(7):61-79.
- [47] 李音.“世界民”与“地之子”:19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J].民族文学研究,2014(3):141-156.
- [48] 梁鸿.“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以“世界史”的视野[J].上海文学,2012(4):6-8.
- [49] 吴晓东.乡土经验,乡土世界的未来性:读《上升的大地》[J].书城,2020(7):98-103.
- [50] 罗雅琳.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导言.

The Occurrence of Rural Literature Enlighten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Wei Cece

Abstrac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two different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e is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other is the binary opposition concep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at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as the shif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masses to that of peasants carried out by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of modern China, on the basis of local-central consciousness, it was the rising city that enlightened the countryside. Rural enlightenment paved the path of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 and the temporalization of space. Enlightenment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the countryside. The rural experience of modern China was pregnant with the genes of modernity. Through the way of the countryside, modernity can be carried out and realized in China.

Key words: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rural literature

责任编辑:采薇